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 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陳翠蓮

摘要

1980年總統蔣經國任命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王昇主持「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但是1983年春，劉少康辦公室突然遭無預警裁撤，王昇被派任為巴拉圭大使、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蔣經國為何重用國民黨強硬派代表王昇？王昇劉少康辦公室為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起落？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的發動者嗎？這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未解之謎。

本研究指出，蔣經國作為威權統治者，為了維繫統治於長久，他窮盡溫和或強硬等各種方法，都無法化解黨外民主運動對其政權的挑戰。美麗島大逮捕後，反對運動更加茁壯，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在此刻上場，意味著威權末期統治集團的最後一搏。

保守派王昇自1970年代勢力擴張以來，行事日漸囂張，1980年代獲得大權，更是令人側目。王昇擅權跋扈引起諸多指控，是蔣經國決定將其拔除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闡明威權末期臺灣統治集團的實況。獨裁者老邁病弱之際，正是統治集團內部激烈政治鬥爭上演時刻。王昇在強人病弱之際掌握大權，引發統治集團內部競爭與緊張關係，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受到各方掣肘抵制，事實上無法順利運作。統治集團內部的對抗，不只來自權力爭奪，也因為自由派與保守派的路線競爭，部分黨務系統與行政官僚具有改革意識、務實主張，認為王昇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鬥爭與宣傳手法，已經無法有效因應時代挑戰。

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末期日益關注臺灣人權狀況與民主發展，蔣經國對臺灣民主化也有若干承諾。王昇等強硬派登場、壓迫人權，違背美方期待。有關美國政府在臺灣民主化中的角色需要更多的研究。

關鍵詞：蔣經國、王昇、劉少康辦公室、威權

The Rise and Fall of General Wang Sheng and His Liu Shao-kang Office: Twilight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1980-1983

Tsui-lien Chen *

Abstract

In 1980,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appointed Wang Sheng,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Warfare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o preside over the Liu Shao-kang Office, which coordinated policy toward Mainland China and political control on the island. However, the Liu Shao-kang Office was suddenly abolished in the spring of 1983 and Wang Sheng was sent away as ambassador to Paraguay, thus excluded from the core of power in Taiwan. Why did Chiang Ching-kuo appoint the hardliner Wang Sheng to this powerful position? And why did Wang Sheng and his office experience such an abrupt rise and fall? Did Chiang Ching-kuo indeed initiat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s an authoritarian ruler, Chiang Ching-kuo had exhausted various methods in maintaining his regime yet still failed to resolve challenges from the Tang-wai democratic movement.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Formosa* magazine group,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actually grew stronger. The emergence of Wang Sheng and the Liu Shao-kang Office at this juncture signified a last-ditch struggle by Chiang's ruling group in the final days of Taiwan's authoritarian era.

Wang Sheng had behaved with increasing arrogance since the expansion of his power in the 1970s. His control over the Liu Shao-kang Office caused even greater uneasiness among his peers in the early 1980s. As Wang Sheng's domineering styl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criticisms within the regime, it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led to Chiang Ching-kuo's decision to remove hi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power dynamics within the ruling group toward the end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Taiwan. An old and ailing dictator set the stage for a fierce political struggle within the ruling group. Wang Sheng's enhanced power triggered competition and tension among the factions. Resistance from other faction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Liu Shao-kang Office to operate smoothly. There was also a rivalry between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within the group. Some party memb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more pragmatic and reform-minded, who saw Wang Sheng's hardline views and methods as ineffective in handl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o the regim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lso began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aiwan's human rights condition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1970s.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had made commitments to the US 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The rise of hardliners such as Wang Sheng and his o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clearly went agains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ore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on the role of US government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Keywords: Chiang Ching-kuo, Wang Sheng, Liu Shao-kang Office, Authoritarianism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 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陳翠蓮**

壹、前言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這位威權體制的新強人一上臺就面臨內外局勢的巨大挑戰。對外，同年底美國宣布將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79年元旦，利用與美國建交機會，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建議兩岸商談結束軍事對峙、實現「祖國統一」，並呼籲進行「通郵、通商、通航」（三通）與「探親、旅遊、學術文化、體育工藝交流」（四流）。同時，鄧小平發表「和平統一」重要談話，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宣稱統一之後臺灣可維持現有社會經濟制度與軍隊。¹ 對內，黨外人士在1977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席次大有斬獲之餘，打算在1978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乘勝追擊，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構成極大壓力。

臺灣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過程中，蔣經國的角色頗受討論。社會學

* 本文曾在「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臺北：國史館，2020年12月12-13日。

收稿日期：2021年4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7月13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¹ 高素蘭，〈中共對臺政策的歷史演變（1949-2000）〉，《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2004年9月），頁203-205。

者吳乃德認為，由於美麗島事件對臺灣社會造成巨大的情感動員效果，蔣經國不但未能有效壓制民主運動，反而使民眾同情反對人士、運動更加蓬勃。蔣經國面臨更大的難題，如果選擇繼續壓制，可能直接挑戰強大民意、甚至失去政權。因此，吳乃德認為蔣經國選擇了讓步妥協，這也顯示他是一位「理性的獨裁者」。² 曾經擔任國民黨政府建言角色的吳建國則指出，蔣經國擔任總統的第一任期（1978-1984）極端保守，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自由主義分子經常建言，但並無改變的跡象。一直到第二任期發生了江南命案、十信事件，蔣經國的態度才開始轉變，蔣經國是被迫改變、不得已而為之。³ 吳乃德、吳建國兩位學者分別以美麗島事件、江南案作為臺灣政治發展的轉捩點，指出蔣經國從鎮壓到妥協、保守到開放的被動性。

但另一方面，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1979年10月政治報告指出，臺灣情治官員主張以強硬手段對付黨外挑戰者，但蔣經國小心翼翼評估美方輿論可能的反應後，否決了上述提議，選擇採取比較溫和的作法。美方認為，儘管臺灣威權統治集團內明顯有以軍情機關如高魁元、王昇等人為主的強硬派，但黨部如陳履安的自由派、技術官僚如俞國華為主的實務派角色日益重要，因此預測日後蔣經國的接班安排也將以技術官僚為主。⁴ AIT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 1925-2013）也在回憶錄中指出，蔣經國告知他早就有意進行民主改革，但一度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造成的緊張情勢而延緩。丁大衛認為臺灣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蔣經國與執政黨內部、也來自反對勢力；他盛讚蔣經國是一位有遠見、聰明、謹慎的政治人物，維繫了臺灣的繁榮安定與民主進程，而對蔣經國有相當正面的評價。⁵ 蔣經國逝世後，丁大

²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臺北：春山出版公司，2020年）。

³ 吳建國，《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7年），頁10。

⁴ Post-normalization Taiwan, AIT, October 23, 1979, U.S. in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本報告共有15頁，主要在評估美中關係正常化對蔣經國權力與臺灣政治發展的衝擊，報告中認為蔣經國權力異常穩固，並針對情治機關、軍方、黨部、技術官僚、私部門企業界等五個部分的想法進行分析。

⁵ David Dean, *Unofficial Diplomac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 Memoir* (Bloomington, Indiana: Xlibris, LLC, 2014), pp. 162-164, 173-178.

衛有意為他立傳，在《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資助下，邀請曾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共事的前國務院同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 1931-），撰寫《蔣經國傳》。⁶ 美方的觀察顯示，儘管統治集團內有強硬派與保守派不同路線之爭，但蔣經國擔任總統顯現溫和改革傾向，推動臺灣民主化。

前述兩種看法，一指蔣經國被迫改革，從強硬到開放；一指蔣經國主動選擇溫和改革路線，帶領臺灣順利走向民主政治，針對蔣經國與臺灣民主化的關係，看法可謂分歧。林孝庭所著《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方式，他認為蔣經國雖然於1970年代開始「本土化」工程，但對黨外人士的競爭抱著敵視的態度，缺乏對「民主」價值的基本認識；他的理想體制是一種父權制、由國民黨領導的開明專制。直到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幾年，因為美國的壓力與日俱增、對岸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競爭，中華民國若不進行改革將坐以待斃，這兩大因素促使他決心走出保守氛圍，推動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工程。⁷

1980年蔣經國指定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1915-2006）擔任重要工作，因應內外危機。王昇所主持的神祕單位「劉少康辦公室」被稱為「太上中常會」、「太上行政院」，權傾一時。但是，1983年春王昇無預警被外派巴拉圭擔任大使、劉少康辦公室被裁撤，偌大權力一時之間竟然灰飛煙滅。

由於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頗受側目，民間傳說王昇權力幾可通天、無所不能。直到2000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這位民主時代的國家領導人，當選後拜訪的第一位前朝權力人物就是王昇。陳水扁說：「王昇將軍是政戰永遠的老校長，就是因為政戰工作長期扮演安定軍心的關鍵，政權交接才如此順利平和」，恭敬地表達對這位政戰將領的肯定。⁸ 即便當時王昇早已失勢多時，但是，對黨外運動菁英而言，仍然認為他在

⁶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該書中譯本為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0年）。

⁷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臺北：遠足文化公司，2021年），頁323-374。

⁸ 〈陳水扁拜會國策顧問王昇〉，收入「華視新聞網」：<https://news.cts.com.tw/cts/>

軍中的影響力令人畏懼，是首位必須爭取支持的對象，以防新政權不穩。

就在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的轉型期，蔣經國任用強硬派代表人物王昇，他的權力到達頂峰、旋即快速殞落。上述幾種對蔣經國與民主化關係的詮釋方式，如何合理回答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的權力起落？如果蔣經國早已打算推動民主改革，為何突然任命強硬派王昇擔任要職？如果蔣經國是因為臺灣社會的強大壓力才進行改革，那麼在1983年政權並未遭遇重大挑戰下為何突然撤換王昇？又，美國政府對臺灣民主化有多大的影響力？

有關王昇生平與權力起落，已有幾部作品討論。一類是王昇的門生子弟所作傳記，為他的突然失勢大抱不平。政治作戰學校第一期畢業生、作家尼洛（李明），訪談王昇本人、並參考王昇日記，完成《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一書。⁹ 政工幹校畢業、曾任政戰學校教官、擔任過王昇秘書、華視副總經理的陳祖耀，則在2006年王昇逝世後出版《王昇的一生》。¹⁰ 兩書都強調王昇人格高尚、淡薄權位、謗譽不計、胸懷坦蕩，一生只為反共愛國而努力奮鬥。他們也感嘆王昇失勢的主因是黨內政爭，蔣經國與王昇的信任關係受到分化離間。王昇自己則認為是以習仲勳為首的中共「擒王小組」所放出「王昇升王」等惡毒謠言得逞所致，感嘆「千古忠貞齊被妒，英雄何日淚始乾」。¹¹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學院教授Thomas A. Marks所著*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Wang Sheng and the Koumintang*訪問了王昇本人、子女、相關黨政人士，對王昇的「反革命運動」——建立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政治作戰工作，使國民黨政府有效控制軍隊、國家與社會，給予相當推崇；並認為王昇失勢的主因在於劉少康辦公室工作過於成功，以致招來不滿與忌妒。¹² 上述這些作品，都比較站在王昇的角度論事。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為何出現？又為何突然被裁撤？在威權統治末期這樣驟

general/200004/200004140041302.html（2020/10/30點閱）。

⁹ 尼洛（李明），《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

¹⁰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¹¹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405-416；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92。

¹² Thomas A. Marks,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Wang Sheng and the Koumintang* (London: Frank Cass, 1998). 該書中譯本為Thomas A. Marks著，張聯祺、李厚壯等譯，《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頁289-300。

然的權力起落，顯示何種意義？在民主轉型已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一個謎。這是本文所欲探索與解答的問題。

以下，筆者利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所藏的劉少康辦公室檔案、王昇日記、¹³ 郝柏村等黨政人士回憶錄、黨外雜誌報導等史料，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王昇相關史料，包括1950-2000年共51冊王昇日記，以及24卷正式文件、演講、會議記錄、信函和照片，其中包括1箱劉少康辦公室檔案。¹⁴ 據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指出，這些史料是由王昇僚屬在王昇逝世後捐贈給胡佛研究所，由於劉少康辦公室解散十分匆促，相關檔案保存並不完整。¹⁵ 本文主要使用1980-1983年王昇日記及劉少康辦公室檔案。

貳、王昇與蔣經國

1938年，方從蘇聯返國不久的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行政督導專員，推動「建設新贛南」工作，初試啼聲。他同時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創辦「江西青年幹部訓練班」（青幹班），王昇是第一批培訓的年輕幹部，王昇與蔣經國兩人的緊密師生關係自此建立。

王昇，號化行，江西人，中央軍校畢業。據說王昇因為成績優異，被派到專員公署擔任視察，協助推動贛南新政。同為青幹班成員之一的章亞若，與蔣經國產下一對雙胞胎後，因故死亡，由於並非婚姻關係所出，雙胞胎由娘家撫養、王昇協助照料。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後，孝嚴孝慈兄弟移往新竹居住，由王昇長期照顧。¹⁶ 早期的師生關係、加上託付幼子的私人關係，在在使得外界揣測

¹³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Collection Number: 2013C5.

¹⁴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http://www.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j96716/?query=wang+sheng>. Accessed April 5, 2021.

¹⁵ 郭岱君教授在2020年12月13日「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說明胡佛研究所的王昇史料捐助經過。

¹⁶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11-24。

蔣經國高度信賴王昇。

除了私人關係之外，王昇也一路追隨蔣經國的政治工作。1948年為拯救財政危機，推行金圓券政策，蔣經國奉命擔任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王昇被任命為大隊長，協助「上海打老虎」。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將內戰中軍事失敗歸因於軍隊缺乏堅定信仰，因此成立國防部總政治部、推動國軍政工制度，強化官兵「精神武裝」，由蔣經國主持相關工作。1950年夏，王昇奉蔣經國之命在淡水沙崙開辦「政工幹部訓練班」，並籌辦「政治工作幹部學校」（政工幹校）。1951年7月，政工幹校在北投復興崗正式設立，王昇擔任訓導長，1953年升任教育長，1955年升任校長，1960年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兼執行官，至1975年升任總政治作戰部主任。

王昇如同蔣經國在總政治部的代理人，擔任政工制度與政戰工作中最核心的任務。1963年國防部「總政治部」改為「總政治作戰部」，「政工人員」改稱「政治作戰人員」，政戰工作從防禦性轉變為攻擊性，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物理、七分心理」，主要目標在「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戰勝敵人」。¹⁷ 此後，政戰工作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從軍中到社會」、「從基地到敵後」，成為全面的宣傳、動員與精神鬥爭。此一思想作戰核心不僅在「反共」，並將「臺獨」視為「共匪對臺思想統戰的陰謀伎倆」，必須積極打擊。¹⁸

因為政戰工作逐步擴張，從倡導新文藝運動、文武青年交流、三民主義巡迴教育，到中影製片廠、青年戰士報、華視電視公司、黎明文化事業所進行的社會宣傳，甚至創辦「心戰研究班」（心廬）聚集大學教授作為智囊班底，都是其運用範圍。¹⁹ 1970年代王昇的勢力範圍已從軍中擴展到文化界、傳播界與學術界。1975年蔣介石逝世，作家江南（劉宜良）如此描述：

¹⁷ 吳子俊主編，《國軍政戰史稿》，上冊（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83年），頁53-58。

¹⁸ 吳子俊主編，《國軍政戰史稿》，下冊（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83年），頁1003-1009。

¹⁹ 吳子俊主編，《國軍政戰史稿》，下冊，頁681-960；馮滄祥，〈追憶經國總統與王昇將軍〉，《傳記文學》，第90卷第4期（2007年4月），頁103-122。

一九七五年，蔣先生去世，經國接班，太子門生，如水銀瀉地，除財經界尚是一片乾淨土外，情治系統、文化娛樂以及黨政新聞界，無不盤據侵吞。²⁰

1980年蔣經國面對與美斷交、中共統戰攻勢，王昇依舊是他重要助力。一生追隨蔣經國的王昇也因此登上權力的高峰。

叁、劉少康辦公室的成立

一、「固國小組」

1979年鄧小平發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談話，為有效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展開的強力宣傳，蔣經國在1月6日指示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楚崧秋立即成立反制中共統戰的臨時任務編組，後來稱為「固國小組」。該小組設在國民黨中央宣傳指導小組之下，由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新聞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蔣經國並指定楚崧秋擔任執行召集人，同年1月2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研擬「反統戰」對策。²¹

固國小組下設有資料、研判、協調三組，由五個參加的主幹單位各借調一、二位熟諳敵我情勢的人員參加，合計不到10人，無固定預算經費，並以國家安全局所撥借臺北市瑞安街一招待所作為辦公室。該小組本身並無執行能力，而是採取會報形式，所有決議必須透過黨政協調後施行，方能落實。

固國小組主要成果是，針對中共三通四流的統戰攻勢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但因美麗島事件以後內外挑戰加劇，楚崧秋向張寶樹建議，希望由人力物力更充實的單位來負責工作。1979年12月14日，蔣彥士

²⁰ 江南（劉宜良），《蔣經國傳》（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頁271。

²¹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攬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138。

出任黨秘書長、接任固國小組召集人，蔣經國決定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接手固國小組工作。1980年3月25日，固國小組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總計運作了一年三個月時間。

主導美麗島事件文宣工作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在口述訪問紀錄中指出，他是因為主張美麗島事件公開審判、同意新聞媒體採訪軍法大審，被批為「精神污染」，導致去職。²² 究竟是誰這麼有力，能夠指控國民黨文工會與楚崧秋造成「精神污染」呢？王昇日記中如此記載：

自高雄暴力事件公開審判後，遺下十分嚴重的政治污染，昨天早上在匆忙中趕寫一件報告，請蔣秘書長轉呈主席如何採取一系列的行動，希望在思想戰場上能掃除思想上一切污染。²³

又記曰：

此次高雄暴力事件，分明是叛亂行為，但公開審判後，引起許多人的爭論，是否構成叛亂罪、證據是否充足，尤其是站在英美法系的觀點，更有許多疑問。加之被告在軍事法庭上利用公開審判，使他們在政治污染上為所欲為，在大眾思想上造成不少迷惑，而以後處理類似事件如何使法條分明，在正名方面，都有深加考慮的必要。²⁴

面對王昇的嚴厲指控，楚崧秋耿耿於懷、無法諒解，他甚至欲聯合「戰友」阻撓王昇接任固國小組工作，但最後仍不敵去職、轉任黨營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²⁵ 而掃除高雄事件以來的「精神污染」，正是王昇接手初期的主要任務。王昇日記中這麼說：

關於如何展開對敵鬥爭工作，使我費心最切，目前除急待清除高雄暴力事件公開審判所造成的精神污染以外，以下幾件事急待進行：

²²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攬盡滄桑八十年》，頁135-140。

²³ 〈王昇日記〉，1980年3月30日，Wang Sheng,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 Hoover Institution, Collection Number: 2013C5. 以下稱王昇日記。

²⁴ 王昇日記，1980年4月2日。

²⁵ 王昇日記，1980年4月11日、5月2日、5日。

- 一、決定人事完成編組。
- 二、決定較適用的辦公場所。
- 三、迅速研擬基地、海外、大陸三個工作計畫綱要。
- 四、建立王復國辦公室拓展工作的有效途徑與具體辦法。²⁶

不過，日後王昇的子弟兵為他所作傳記，都強調王昇在權力競爭中的被動角色。王昇及其學生說，1980年1月30日國民黨中常會後蔣經國召見，指定王昇負責「反統戰、對敵鬥爭」的任務，王昇婉拒再三，但蔣經國極為堅持。最後王昇提出條件，希望該小組設在黨秘書長蔣彥士之下，所有事情由蔣彥士向主席蔣經國報告，才同意接任。²⁷

二、從「王復國辦公室」到「劉少康辦公室」

1980年4月1日，固國小組改組為「王復國辦公室」，辦公室人事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上簽蔣經國，任命辦公室主任王昇、書記李廉，「基地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吳俊才、「大陸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徐晴嵐、「海外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錢復，蔣經國總統批示「同意」。²⁸ 辦公室處所也由國安局所借用之瑞安街招待所，搬遷信義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樓11樓。²⁹

1981年4月20日，王復國辦公室為顧慮化名日久洩漏，5月起再更名為「劉少康辦公室」。³⁰ 無論「王復國」、「劉少康」，其實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

²⁶ 王昇日記，1980年4月14日。

²⁷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362-363。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72-273。王昇日記中詳細記載了1980年1月30日與蔣經國的對話，對於「對敵工作」再三推辭。但筆者判讀，日記中所寫「我堅信我不宜擔此重任，今後可能身敗名裂，三次堅辭，他（指蔣經國）三個考慮過了，我怎麼辦」等文字，因原子筆墨水色較深，可能是後來才補上的。王昇日記，1980年1月31日。

²⁸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Collection Number: 2013C5, Box No. 5.（以下簡稱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²⁹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366。

³⁰ 「王復國辦公室更名為劉少康辦公室」（1981年4月20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Collection: 2013C5, Box 5.

敵鬥爭辦公室」的化名。

為加強三個研究委員會功能，基地委員會增加文工會主任為召集人、海外研究委員會增加海工會主任為召集人、大陸研究委員會增加陸工會主任為召集人。³¹ 6月，以「加強黨政聯繫、提高對敵鬥爭功能」名義，三個研究委員會設置召集人2名，分別為基地委員會召集人吳俊才、周應龍；海外委員會錢復、曾廣順；大陸委員會徐晴嵐、白萬祥。³²

劉少康辦公室成立宗旨為「加強對敵鬥爭、粉碎臺獨陰謀」，與固國小組時期所定位的「反制中共統戰」已有所不同，除了功能定位從被動防禦變成主動進擊之外，打擊對象也從「中共」擴展到島內與海外的「臺獨」。Thomas A. Marks就認為，劉少康辦公室不僅應付中共統戰策略，更成為蔣經國政策諮詢智庫，最特出的一點是將臺灣內部問題融入「對敵鬥爭」思維中，並在實質上對任何政策提供建言。³³

其次，劉少康辦公室此一任務編組，是國民黨內部之秘密組織。蔣彥士在簽呈中說明：

本辦公室作為本黨秘密單位，受秘書長督導，只對秘書長行文（對秘書長行文時得啟用王復國印章），不對外公開及行文，必須呈 主席核奪之文件由秘書長轉呈，不直接報告。³⁴

辦公室人員編組調任及專任人員以不超過20人為限，初期設主任1名、書記1名、秘書3名，基地、海外、大陸三個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各設召集人1名，專任研究員3-5名，兼任研究員4-6名。因為是秘密組織，「本辦公室上列人員無論專任或兼任，均為黨內秘密職務，不得對外公開。」³⁵

³¹ 王昇日記，1981年5月20日。

³² 「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實施要點」（1981年6月1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³³ Thomas A. Marks著，張聯祺、李厚壯等譯，《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頁284-285。

³⁴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³⁵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再者，辦公室的運作還有兩個原則：1、成立之初即強調，作業方式可採取提供諮詢、主動建議或專案研究，必須以「不破壞現行體制、不干預各單位職權」為前提。1982年1月修訂「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再度強調該辦公室作法是「不破壞現行的體制，不干預各單位的權力」。³⁶ 2、該辦公室呈辦核定之事項，以秘書長名義「密函」各有關單位從政、從業同志遵照辦理；此類文件需列入管制、追蹤考核、按時責效，實施結果由機關首長親自函復；函復文件為黨內絕對機密，不得將原件交辦、不得對外公開。³⁷

簡言之，劉少康辦公室以「加強對敵鬥爭、粉碎臺獨陰謀」為宗旨，定位為尊重現行體制運作的黨內秘密任務編組。其組織、編制與成員請參表1。

劉少康辦公室每週二召開對敵工作會報（早餐會報），由蔣彥士主持、王昇等人出席，並邀請黨政相關部會人士出席參與。但是，因為蔣彥士本人常常缺席、由秘書代理，會報流於形式，所作決議也未能受到黨政部門高度尊重與管策執行（詳見下文）。為了強化功能與決策約束力，王昇於1981年5月提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實施要點」，6月正式施行。

強化功能後的劉少康辦公室運作方式請參圖1。亦即，每月第一週的星期二由王昇主持三個研究委員會的「研究會報」，研究敵情、擬定各種計畫方案，並邀集有關單位與學者專家參加。每月第二、三週由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主持「綜合會報」，協調、通過各項呈報之計畫方案，並邀有關各主管機關參加。每月第四週則由行政院長孫運璿主持「決策會報」，邀集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等高層、及相關中央部會首長聽取報告與工作指導方針。³⁸ 各項方案經過三次以上的反覆研究討論後，最後由蔣彥士呈報蔣經國核定，並由蔣彥士協調黨政機關貫徹執行。³⁹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³⁶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2年1月30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³⁷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³⁸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373-376。

³⁹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75-276。

表1、劉少康辦公室組織與編制

組織分工	名稱	負責人		
劉少康辦公室		主任/王昇 書記/李廉		
行政單位		秘書	成員	
	計畫	李明 李在方 (中華日報副社長) 邢國強	陳濯明、楊台生、佟立家	
	情報	郁光	張虎、鄧鶴庭、錢行偉、蘇成福	
	協調	趙孝風		
	行政	汪振堂	劉書德、陳子樸、康雅玲、鍾淑芬	
工作單位		召集人	秘書	成員
	基地對敵鬥爭委員會	吳俊才 (前文工會主任、 黨副秘書長) 周應龍 (文工會主委)	朱文琳	于振宇、王人傑、杜均衡、李模、宋楚瑜、周菊村、施啟揚、郭哲、殷文俊、郭為藩、梁孝煌、曹伯一、廖祖述、趙守博、蔣廉儒、蕭天讚、李在方、陸潤康、王昭明、王章清、甘毓龍、朱文琳等23人
	海外對敵鬥爭委員會	錢復、丁懋時 (外交部次長) 曾廣順 (僑委會主委)	劉國治 謝復生 (政大政治系教授)	明鎮華、汪奉曾、柯叔寶、朱集禧、連戰、何顯重、王紀五、蕭萬長、郁慕明、趙寧、章孝嚴、戴瑞明、張京育、虞為、高銘輝、劉國治、謝復生等17人
大陸對敵鬥爭委員會	徐晴嵐 (前陸工會主任、 前黨副秘書長) 白萬祥 (陸工會主委)	張鎮邦 徐崇藝 王澄宇	宋公言、林清江、蕭政之、焦金堂、王徵麟、鄧祖謀、荊自立、項迺光、裘孔淵、張鎮邦、曾光亞、黃達紀、姚孟軒、洪幼樵、李明、辛尚志、徐崇藝、王澄宇等18人	

資料來源：「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實施要點」（1981年6月1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汪振堂，〈揭開「劉少康辦公室」面紗〉，《傳記文學》，第90卷第2期（2007年2月），頁45-50；吳建國，《破局：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頁149-180。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
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蔣經國

↑

會報名稱	參與者	開會時間 (每月)	開會地點
決策會報	主持人： 行政院長孫運璿 出席者： 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 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 國安會秘書長沈昌煥 行政院秘書長瞿詔華 辦公室主任王昇、書記李廉 相關黨政工作主管	第四週週二	行政院

↑

綜合會報	主持人： 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 出席者： 國家安全局長 行政院秘書長瞿詔華 辦公室主任王昇、書記李廉 三個研究會召集人	第二、三週 週二	國民黨中央黨部
------	--	-------------	---------

↑

研究會報	主持人：辦公室主任王昇 出席者： 書記李廉、各組秘書 三個委員會召集人	第一週週二	劉少康辦公室
------	--	-------	--------

圖1、劉少康辦公室對敵工作會報運作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實施要點」（1981年6月1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相較於固國小組處於守勢，劉少康辦公室則採取攻勢，更將臺灣內部的反對運動視為臺獨、納入成為「對敵鬥爭」的範圍。該辦公室工作重點在擴大基地「自強運動」，堅定反共、反臺獨之認識，鞏固團結，粉碎島內顛覆陰謀；推展海外「救國運動」，海內外集中意志，粉碎中共統戰陰謀；掀起大陸「自救運動」，經由心戰加深敵人內部分化，吸引大陸工農與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之嚮往，「政治學臺灣」、「經濟學臺灣」。⁴⁰ 1982年1月，劉少康辦公室進一步修訂「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認為中共的統戰工作分為兩大方面：一方面將原有「對臺辦公室」擴大為「臺灣工作領導小組」，直屬政治局常委會，由黨、政、軍、群分別執行統戰決策，大力推動「通郵、通商、通航、和平、統一」活動，我方如果繼續採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將在國際上形成「頑固、好戰」之假象。另一方面，在「看不見的戰場」上進行思想麻醉，利用鄉土文學論戰等分化政府與民眾、本省人與外省人、黨內與黨外，並以核心組織與外圍組織並進，製造群眾事件、進行暴力顛覆。該綱要中強調，敵人統戰陰謀採取「三分島外、七分島內」作為，島內活動一旦時機成熟，立即進行「血洗台灣」。⁴¹ 由此可知，劉少康辦公室將外部敵人中國共產黨與內部敵人黨外人士視為一體，島內活動愈加成為打擊的重點。

至1981年年中，該辦公室陸續完成「加強海外對敵鬥爭工作要點」、「加強大陸對敵鬥爭工作要點」與「加強基地對敵鬥爭工作要點」，作為海外、大陸、基地三大工作準則：

（一）海外對敵鬥爭

敵人的陰謀是「外部孤立、內部分化」，故須鞏固外交陣容，徹底瓦解臺獨組織活動，爭取僑界、學人、留學生，策反共匪外派人員等。具體工作包括由國民黨海工會強化海外黨部基層組織，遴選忠黨愛國學人、僑民與留學生成立核心小組對敵鬥爭；外交部應就駐在國民間人士、有力人士詳細調查登記、妥善加以運用；僑委會在美、日、港等地聯合忠貞僑胞團結僑眾力量，爭取、聯繫並運用

⁴⁰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0年5月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⁴¹ 「現階段加強對敵鬥爭工作綱要」（1982年1月30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所在地政府組織反共有力人士；教育部應對出國留學生進行為期一週之集體講習，以堅定信心、武裝其思想，增強對共匪與臺獨之認識；留學生出國後，海工會、教育部應運用各地黨部留學生組織，妥為安頓、聯繫感情；交通部應對所有出國觀光民眾進行兩小時簡報，說明海外共匪及臺獨之危害等等。⁴²

（二）大陸對敵鬥爭

鬥爭目標在一面使敵方意識形態、政策路線由分歧而轉變、混亂、致失敗；另一面對大陸關鍵地區加強各種攻擊性行動，以引發、擴大反共革命運動。工作方針則是設立「心戰指揮會報」，檢討政策、協調各單位工作；國家安全局專設「謀略小組」，負責規畫對匪謀略作戰，並統一指導有關單位；加強對匪策反工作、為我秘密工作；利用關係接觸附匪人員、臺盟分子，施以影響分化；加強對香港基地之運用，對華南一帶匪軍官兵收買利用、為我工作等等。⁴³

（三）基地對敵鬥爭

該辦公室認為，敵人之陰謀策略是「三分島外、七分島內」，必須鞏固內部方能勝敵，所以主要任務是強化黨組織，使本黨能深入職業性、學術性、宗教性、宗親性、經濟性、社會性之群眾基地建立核心，務使社會各階層「關鍵人士」皆能網羅入黨；情治單位應發揮統合功能，全面深入掌握「匪諜」、臺獨等違法組織；強化黨的小組調查工作，要求「每一黨員都是情報員，每一小組都是調查站」；國民黨中央宣傳指導小組應改為「思想工作指導會報」，由文工會承辦業務，展開反共、反臺獨之思想作戰；文工會成立「理論小組」，對國民黨史、三民主義深入研究；透過新聞傳播進行對敵思想意識之鬥爭，加強對新聞傳播界、從業人員之聯繫與指導；中共利用臺獨叛國組織之狹隘地域觀念，進行「惡毒之分化陰謀」，應由國家安全局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情報蒐集、研判與協調各單位採取積極行動，全力瓦解臺獨組織、遏制叛國活動。⁴⁴

⁴² 「加強海外對敵鬥爭工作要點」（1981年6月7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⁴³ 「加強大陸對敵鬥爭工作要點」（1980年9月8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⁴⁴ 「加強基地對敵鬥爭工作要點」（1980年9月8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

王昇子弟兵為他所作傳記中，推崇劉少康辦公室三個研究會的工作成果，主要包括：基地工作主要完成了迎接自強年升旗活動、並成立「團結自強協會」、世界女子壘球比賽反守為攻、全民加入聯合作戰行列、推動明恥教戰的「教孝月」活動、樹立反貪腐的「梅花餐」、「爸爸回家吃晚飯」活動。海外工作主要是為即將出國留學青年舉辦「大鵬營」反統戰講習、民眾出國觀光的行前教育講習。大陸工作則成立了「心戰指導會報」、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抗中共統戰、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號召吳榮根、孫天勤、蕭天潤、陳寶忠等「反共義士」駕機投誠等等。⁴⁵

雖然劉少康辦公室的運作前提是「不破壞現行體制、不干預各單位職權」，但實際上，該辦公室藉由研究與建議方式，介入黨、政、情治等各部門事務，也透過這個方式，王昇的權力不斷擴大。我們可以從1982年12月劉少康辦公室年終檢討會所提出的兩年來工作報告（參附錄1）看到，劉少康辦公室要求黨政情治各機關配合推動對敵鬥爭工作，包括國民黨青工會、文工會、社工會、海工會、陸工會、政策會、革命實踐研究院；行政院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新聞局、文建會等；情治部門如國家安全局、調查局、警備總部，甚至民間團體世盟、亞盟等，都在其指揮協調範圍內。該辦公室研議事項不僅止於加強內部團結、反共宣傳、爭取海外僑胞支持，而是擴及國內政治事務、長老教會等宗教問題、國會聯繫與改革、選舉策略、民生物價、證券金融，甚至便民措施、警察形象等等各種議題無不插手，權力之大，真可謂無所不及、無遠弗屆。

肆、圍堵黨外運動與臺獨運動

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曾對國內黨外人士民主運動日益活躍，研擬對策。在一份國民黨中央黨部呈給蔣經國的「對最近國內政治陰謀份子活動策略的研析」報告中，中央黨部認為處理黨外運動所遭遇的主要困難在於：1、美國正以「保障人權」為由干涉他國內政，以致處理國內政治

⁴⁵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377-404；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75-277。

問題形成若干顧慮，如韓國、菲律賓政局動盪不安，不能不有所警惕。2、國民黨同志與社會人士對於處理黨外運動看法不一，主嚴懲者多、主容忍者少。3、執法單位對黨外人士涉法案件觀點不同，應以司法或軍法手段處置頗有爭議。更重要的是，4、政府、情治機關與黨部，對於處理此類問題尚無專責單位，形成「都有責任、都無責任」與「都要管、都不管」的現象。⁴⁶

劉少康辦公室成立後，認為敵人攻勢是「三分島外、七分島內」，所以對敵鬥爭的重點不在遙遠對岸的中共，而在島內的黨外運動人士。在大陸、海外、基地三大工作中，王昇就認為「大陸工作最難，海外工作最繁，基地工作最急，目前以鞏固基地健全本身最為重要。」⁴⁷於是，針對島內政治情勢所做的基地對敵鬥爭，成為該辦公室主要工作。

王昇認為美麗島事件後，對敵鬥爭最重要的工作是掃除高雄暴力事件公開審判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基地最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國內「精神污染」的問題，必須加強思想作戰、心理建設。⁴⁸他並判斷，美麗島事件後「臺獨陰魂未散，海外陰謀份子與共匪結合」，「利用基地選舉、進行內部分化」；⁴⁹黨外運動背景不單純，「他們背後不僅有臺獨關係，而且有國際陰謀，所謂反對黨已呼之欲出……氣候業已形成，今後在政治上創多事之秋矣」；⁵⁰「因為共匪利用臺獨，臺獨與國內分歧份子勾結，加上長老會部分教會問題，反黨份子以『民主』、『制衡』等漂亮口號，對政府、對黨做以偏概全的攻擊，加上狹隘的地域觀念，的確令人擔心。」⁵¹在這樣的認知下，打擊島內黨外人士、反對運動成為劉少康辦公室的工作重點。

⁴⁶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呈蔣經國對最近國內政治陰謀分子活動策略的研析」（1979年10月17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15-009。在這份報告中，國民黨高層認為黨外運動日漸形成氣候的主要原因有五：國內知識分子政治參與要求日漸升高、部分人士因外交逆境要求政治改革、「新生分子」與「管考分子」出獄後形成對政府不滿的群體、「共匪」與臺獨直接或間接鼓勵與誘惑、黨與政府的若干措施不能盡如人意。

⁴⁷ 王昇日記，1982年10月19日。

⁴⁸ 王昇日記，1980年4月14日、1982年5月17日。

⁴⁹ 王昇日記，1980年11月24日。

⁵⁰ 王昇日記，1981年11月8日。

⁵¹ 王昇日記，1981年11月15日。

一、壓制黨外運動

在以基地工作做為首要目標之下，1982年4月，劉少康辦公室提出「當前國內分歧活動概況與對策研究」，認為「部分無黨籍政治人士言論行動，已受共匪經由海外臺獨組織煽構利用」，進而指示以下攻勢：

（一）在思想上：1、一切大眾媒體不再以「黨外」稱呼無黨籍人士，各報刊可依其言行破壞程度稱為「分歧份子」或「政治野心份子」。2、對於當前中共統戰與臺獨活動陰謀之兩者勾結情形，均應析述論證，務使家喻戶曉。3、運用報紙、電視、廣播、雜誌批判分裂主義、地域主義，導正錯誤思想。4、創辦可讀性高之刊物，並設法使《時報周刊》、《時報雜誌》、《聯合月刊》、《中國評論》等刊物分擔思想作戰之責任。5、運用文化審查遏阻反動刊物，並進行重點駁斥，洗清思想毒素之污染。6、有計畫打入、拉攏《新生代》雜誌，掌握轉化其言論路線。

（二）在組織上：1、使本黨同志確實納入組織，強化黨與群眾關係、建立黨友制度等。2、對無黨籍政治人士建立完善檔案，展開個別爭取。3、透過中央、省、縣各級民意機關中黨的組織，加強與無黨籍同僚聯繫、增進了解。4、對《新生代》分子積極採取轉化措施、輔導發展、協助出國就業。

（三）在選舉上：1、教育選民、強化選監工作與司法配合、新聞報導與輿論之配合等。2、改進提名作業。3、強化輔選功能。4、聯合知名人士，打擊分歧分子選舉荒謬言論；注意蒐集分歧分子領導人物斂財等不法事證，運用同夥予以揭露。

（四）在聯戰上：1、加強與無黨籍人士之聯繫溝通，建立與執政黨之良好關係。2、及早疏通少數人醞釀反對黨之行動，必要時依「戒嚴法」加以取締。3、對民社黨、青年黨積極輔導，使其擔任在野黨之角色。⁵²

⁵² 「當前國內分歧活動概況與對策研究」（1982年4月19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

同時，為了有效對付黨外人士，對策中也建議賦予黨、政與情報各部門之分工任務，包括：由文工會、新聞局負責思想戰場與文化教育領域；組工會、社工會負責組織戰場與社會群眾領域；國家安全局、社工會主掌政治戰場及反滲透、反破壞、反顛覆領域；中央政策會主掌聯合作戰領域。

劉少康辦公室鎖定應予轉化的《新生代》雜誌，發行人是王應傑，創刊之初是由具有左翼色彩的汪立峽主編，以猛烈砲火批判國民黨政府對大學校園的控制，被視為黨外雜誌之一。但是，汪立峽於第5期後辭職，第10期以後該刊面目逐漸模糊，後期總編輯據指出是調查局出身，雜誌內容更轉向反對美麗島家屬參選、力捧國民黨提名的吳梓，該刊因此獲得國民黨文工會資源挹注，加入對抗黨外的行列。劉少康辦公室順利達成轉化《新生代》的目標，讓黨外政論圈深感驚訝與惋惜。⁵³

1982年5月，王昇建議對國內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進行全面調查分析，並分別提出不同應對方法；他也要求黨政各方面應全力加入此一疏導工作，應秉持政治作戰要領，嚴格分工、密切合作。⁵⁴ 7月，王昇認為「臺獨人士與島內陰謀份子已公然串通，顛覆陰謀昭然若揭」，原本期望於文工會的工作根本推不動，因此要求國家安全局將臺獨文件「大量以密件分發教育界、文化界、行政界、傳播界、企業界所有中上級人員人手一份，使大眾完全認清臺獨的真面目，這樣才能達到總統所說，使全民共同唾棄之目的」。⁵⁵

王昇主導對黨外人士開戰，無異是對付黨外民主運動最強硬的第一人。在劉少康辦公室主導下，1980年代以「分歧份子」、「政治野心份子」污名化黨外人士；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鋪天蓋地抨擊黨外運動；對黨外陣營滲透、分化、收編。

⁵³ 〈文工會購買「新生代」雜誌對抗美麗島陣線〉，《前進廣場》，第17期（1983年12月3日），頁43。

⁵⁴ 王昇日記，1982年5月30日。

⁵⁵ 王昇日記，1982年7月11日。

二、打壓言論自由

在「基地對敵鬥爭」的名義下，王昇形式上統合協調黨、政、軍、情各系統，權力顯赫一時。由於國民黨內強硬派凌駕改革派，國內言論空間遭到嚴重壓縮。1982年連連爆發「圍剿陶百川事件」與「《龍旗》雜誌事件」。

1982年3月，國策顧問陶百川在《自立晚報》上發表〈禁書有正道、奈何用牛刀〉一文，抨擊警備總部浮濫查禁刊物、要求保障言論自由，卻遭到各報刊激烈圍剿。4月，黨外立委蘇秋鎮取得警備總部內部文件，在立法院提出緊急質詢，指控警備總部發動媒體圍剿陶百川、無異「殘害忠良」。5月3日《自立晚報》、5月4日《中國時報》相繼披露警備總部「駁斥陶百川先生攻訐警總文化審檢工作座談會」機密文件，披露警備總部政戰主任攻擊陶百川「為敵人開路、其心可誅」、「非常偏激、不可原宥」、「荒謬絕倫、罪無可逭」，在文化審檢工作座談會上發動部分文化人圍剿陶百川，⁵⁶報導一出，外界一片譁然。11月，右翼反共刊物《龍旗》雜誌又在社論上大罵《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是「報霸」、身為國民黨中常委是「國民黨的一大羞愧」；又公然以「余紀忠的報霸作風」等題目舉行徵文活動，對余紀忠展開攻擊。

警備總部與右翼報刊圍剿國策顧問陶百川、中常委報人余紀忠，顯示國內強硬派氣勢高漲，此一打壓行動是誰主使？證諸史料，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確實曾在1982年3月約見陶百川，對他開放黨禁、報禁的主張頗不以為然；並認為立法院「若干分歧份子」質詢言論「與大陸淪陷前附和中共份子的言論如出一轍」。⁵⁷

不過，圍剿陶百川事件鬧大之後，王昇日記中卻反過來抱怨警總政戰部負責文化審檢工作人員水準太低、方法太差，他也在會議上要求警備總部對文化審檢工作要加強改進。⁵⁸此一風波也引起蔣經國關切，詢問王昇，指示此事「錯誤太

⁵⁶ 〈即刻停止圍剿陶百川先生〉（社論），《深耕》，第9期（1982年5月9日），頁1。

⁵⁷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頁72。

⁵⁸ 王昇日記，1982年5月7日、8日。陶百川對此事極為氣憤、準備辭去國策顧問一職，王昇勸他說，他的文章動機可能是愛國的，但方法內容不一定沒問題，國家處境困難，應以國家為重，不能再上「共匪」的當。

大，應該改進」。⁵⁹

三、惡名昭彰的王昇形象

由於王昇勢大，又是國民黨內鷹派的代表人物，被民間所嫉視，諸多不利指控如劍矢般而來。民間認為美麗島事件、黃信介遭逮捕、甚至林宅血案等都是王昇所指使，⁶⁰但實際上，王昇雖然擔任論述、鬥爭與協調工作，卻非警備總部、情報局、調查局、警政署等情報或治安機關的負責人，諸多暴力事件發生，未必與王昇有關。

關於美麗島事件的處置措施，從王昇日記中可以看到蔣經國是真正的決策者。王昇讚嘆蔣經國屢次親自主持「安和會報」、處理美麗島事件指揮若定，「總統對高雄暴力案在政策上把握甚牢，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非常冷靜細緻，有條不紊。」⁶¹又日記中也記載，蔣經國對美麗島事件指示「以洪誌良匪諜案作為黃信介叛亂案之證據；首腦份子交軍法審判、附從份子交司法審判；首犯不判死刑，力求寬大，以彰政府德意。」美麗島事件後的大逮捕與軍法審判，顯然由蔣經國所主導。

民間盛傳1980年2月28日所發生的林宅血案是王昇所下令，以報復美國臺獨聯盟在王昇之子王步天家中放置炸彈。⁶²王步天住宅被炸發生於1980年2月17日，但從王昇日記可知他在26日才接到外交部洛杉磯領事館電報告知，一時甚為激動，日記中記載：「海外台獨組織果然下此毒手，令人髮指！這一次所幸小東（王步天小名）未有受傷，我曾有打算，如果海外台獨份子對我家人有傷害，我將辭職赴美以個人身分與彼等一拚。」⁶³兩天後林宅血案發生。3月1日又記曰：

⁵⁹ 王昇日記，1982年5月9日。

⁶⁰ 王昇日記，1980年6月21日、6月24日。

⁶¹ 王昇日記，1980年1月13日。

⁶²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頁113。

⁶³ 王昇日記，1980年2月26日。王步天家宅爆炸後，王昇為何在九日之後方獲得外交部門回報？其間竟未從王步天、或其他部門獲得消息？頗為啟人疑竇。但在目前資料中，無法獲得更多資訊。

歸途與祖述⁶⁴一再研究林義雄家被殺血案，此案發生在高雄暴力事件嫌犯林義雄之家，發生的時間還是二二八的中午，充滿了政治陰謀，事情決不簡單，由此案可見，敵人心狠手辣，無惡不作，今後問題仍舊層出不窮。⁶⁵

3日，日記中又說「林義雄家屠血案，慘絕人寰，令人髮指，如果判斷不錯，台獨份子此事可做、今後何事不可做，其兇惡口不亞於共匪矣。」⁶⁶

從王昇得知王步天家宅遭炸彈攻擊到林宅血案發生，只有短短兩天時間，若說是王昇下令殺害林義雄一家報復，不無疑問。王昇雖主掌劉少康辦公室，他所主導對敵鬥爭工作，仍需相關單位落實執行，他並非情治機關負責人，無權直接下令特務人員採取暗殺報復行動。從日記中可知，王昇得知林宅血案後情緒激動，並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就反射性地認定是「政治陰謀」、「敵人心狠手辣」。因此筆者認為無法認定王昇為林宅血案的主使者。

1981年7月3日，留美學人陳文成陳屍臺大校園，一般也認為與王昇有關。王昇在12日出席中央黨部早餐會報關注此事，認為「台大校園命案問題，此事最近反應惡劣，我預判必有若干麻煩……我週一就建議中央重視此事，但迄無適當措施。」⁶⁷8月初情勢愈演愈烈，又記曰：

陳文成命案一發生，我就判定此事必有許多麻煩。我曾一再提醒中央黨部負責同志，必須迅謀對策，但新聞界不僅不能配合，反而製造許多更多（按：原文如此）的麻煩。最近海外台獨利用國際若干不友善份子，大吵大鬧，美國國會居然舉行聽證會，幕後共匪亦必推波助瀾，無形中造成不必要的損失。⁶⁸

日記中多次記載陳文成案對蔣經國造成重大困擾，「此案對國家傷害之大，

⁶⁴ 廖祖述，時任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

⁶⁵ 王昇日記，1980年3月1日。

⁶⁶ 王昇日記，1980年3月3日，□為無法辨識。

⁶⁷ 王昇日記，1981年7月12日。

⁶⁸ 王昇日記，1981年8月1日。

真是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但當此事發生之初，我就一再提出警告，惟未為中央主管單位所重視。」「此事還是總統親自交辦，大家才特加注意。」⁶⁹ 陳文成事件發生後，王昇對有關部門因應失當頗有微詞，日記中多所指責，反映出王昇不斷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責備相關單位的心態。果如日記中所述，王昇深知此事會造成許多麻煩、對層峰造成困擾，他還會下令殺害陳文成嗎？

另據檔案可知，警備總部早已緊盯海外臺灣人以金錢資助國內反對運動，並研擬反制對策。1979年10月3日，警備總部透過監聽，就已掌握陳文成與施明德通話紀錄，得知將成立「全美民主基金會」，每個月寄1,500美元來臺作為《美麗島》雜誌之用。⁷⁰ 這是為何1980年夏天陳文成返臺探親、遭警備總部約談的主要原因。陳文成遭警備總部約談後死亡，與王昇並無明顯關係。

筆者認為上述幾項重大案件，王昇並非主導者，正因如此，他才屢屢強調自己洞燭機先，對於黨政同志判斷錯誤、處理失策，大感扼腕。但是，1980年代王昇勢力日大，鷹派路線令人恐懼、惡名昭彰，乃成為民間各種指控的箭靶。

伍、劉少康辦公室解散及王昇去職原因探討

劉少康辦公室在1983年4月突然被撤銷，王昇調為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引起政壇極大震動。同年9月，王昇更被外放為巴拉圭大使，遠離權力核心。針對劉少康辦公室解散一事，坊間推測：一是已完成階段性功能；二是此一秘密辦公室已被海外公開，失去秘密性，必須改變形式。也有人認為因為空軍少校黃植誠叛逃事件、馬壁投共事件顯示王昇的反統戰工作失敗。⁷¹ 但參照相關史料，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因素更值得注意。

⁶⁹ 王昇日記，1981年8月11、17、24、25、9月22日。

⁷⁰ 「警總對海外叛國份子以金錢支持國內陰謀份子之反制措施」、「海外叛國份子以金錢支持國內陰謀份子資料彙整表」，〈防制台獨方案〉，第6卷，《國家安全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A/0047/C300826/1/0006/001/0054-0065。

⁷¹ 〈王昇調職幕前幕後〉，《暖流》，第2卷第5期（1983年5月），頁8-9。

一、王昇勢大行事跋扈

1970年代王昇的勢力範圍從軍中逐步擴大到文化界、傳播界與學術界。如今，透過劉少康辦公室的成立與運作，王昇權力再度擴張，統合協調黨部、行政、情治機關進行對敵鬥爭，頗有呼風喚雨之勢。王昇也相當有意識地經營自己的權力王國，認為「王復國辦公室就要成為一個培養人才的地方，我必須精選一些青年有為之士，參加工作。」⁷² 而蔣經國有關重要黨務人事任命布局，也會徵詢王昇的意見，王昇更不吝建議具體人選。⁷³

1980年代王昇勢力持續擴張，黨外雜誌報導，王昇除了來自軍隊與情治單位兩種力量，同時又發展五種力量：1、後備幹部，全省約二十萬人。2、人文科學會，多年來已累積近千人，多出自海外「愛盟」核心、國內黨政少壯派。3、心廬，在部隊中是軍中文藝核心，在社會上是思想統戰大本營，打擊鄉土文學論戰的司令部、〈南海血書〉的製造所。4、新聞文化事業，《青年戰士報》是主力、《聯合報》是外援、《台灣日報》是新附、黎明文化事業是重要力量，《聯合報》也是政工系統的重要據點。5、工商企業界，透過「軍人之友社」與企業界也密切往來，包括聲寶陳茂榜、臺塑王永慶、國泰蔡萬春等都與之交好。⁷⁴ 黨外雜誌甚至具體羅列在文化界、新聞傳播界、戲劇界與黨政界的王昇政戰系人馬（參附錄2）。

但是，王昇自1975年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之後，行事風格愈來愈受到批評。曾任參謀總長的賴名湯，日記中多處批評王昇行事風格、對他甚感不滿。例如：王昇不守紀律，「院長相信了這樣的人，實在不智」；王昇擅自妄為，竟然敢於不聽從蔣經國命令；王昇器量太小、本位主義；擅越職權，「總是不務正業，做些

⁷² 王昇日記，1980年10月9日。

⁷³ 1981年春，國民黨黨務主管人事異動，蔣經國原本屬意白萬祥、馬鎮方擔任，並要求王昇勸告白萬祥接任高雄市黨部主委，但王昇建議分別由關中、鄭心雄擔任。蔣經國也徵詢大陸工作會人事，王昇建議張家驥、陳堅高兩位中將，並建議張其黑擔任副主委、主管心戰工作。5月2日人事案確定，關中、鄭心雄、張其黑人事都如王昇所建議。王昇日記，1981年4月15日、18日、5月2日、

⁷⁴ 徐策，〈王昇真的失勢了嗎？〉，《前進》，轉引自張耿豪，〈王昇，日日升，升為王？〉，《生根》，第9期（1983年5月25日），頁7。

不應該做的事」，⁷⁵ 甚至認為：

為了王昇的狂妄，我內心很不高興，這種人喜歡玩弄政治，言行不一，搞勢力、樹派別，為國家計，應該將他免職。然而，院長（指蔣經國）似乎有苦心。⁷⁶

1975年蔣經國日記中也記載，他從國防部長高魁元口中得知，王昇對軍中人事安排極為堅持，不禁痛罵王昇「驕橫」、「為之憤怒而痛責之」。⁷⁷ 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後，蔣經國另一臂膀李煥辭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以示負責，黨內開放路線受挫、保守聲勢上揚，外界稱為「李煥（煥）王升（昇）」。但是，蔣經國對李、王兩人都都不滿意，尤其是王昇，蔣經國認為「政工人員之表現令人失望，……我無時無刻不在要求做到大方和負責，奉獻和犧牲，但是他們所表現的，乃是自私、弄權、貪小利」。1978年10月，蔣經國更透過高魁元傳話給王昇「不要多露鋒頭，亦不要過問非其所應管之事」，多年來栽培王昇，「實不願看到他自我毀滅」。⁷⁸

由於王昇權勢如日中天，也招來追高吹捧。作家朱西寧在《聯合報》副刊多日連載〈將軍令〉，稱頌王昇「半生憂勞而童山濯濯，神采氣度，愈似老元首」，「將軍的堅毅、無私、奉獻，皆可感天」，「將軍將軍，執劍的風金剛，天地君親師，新文藝之父」。⁷⁹ 黨外雜誌稱為「蔣經國的接班人」，甚至認為「如果將來台灣政局有重大變動時，或蔣經國因故不能視事時，則王昇應該是最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全斗煥的人」。⁸⁰ 種種耀眼光芒，到了令人感到刺眼的地步。

劉少康辦公室成立後，依舊經常展現強勢作風。王昇日記中不時可以看到他

⁷⁵ 賴名湯，《賴名湯日記III》（臺北：國史館，2017年），頁524、552、609。

⁷⁶ 賴名湯，《賴名湯日記III》，頁527。

⁷⁷ 《蔣經國日記》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收藏，2020年開放閱覽，但因新冠肺炎疫情，筆者無法親自前往調閱抄錄，轉引自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頁147。

⁷⁸ 轉引自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頁149。

⁷⁹ 朱西寧，〈將軍令（上）〉、〈將軍令（下）〉，《聯合報》，臺北，1980年1月23、24日，版8。

⁸⁰ 徐策，〈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縱橫》，第16期（1982年7月），頁7。

長篇訓話、疾言厲色指責黨政官員的場面（見下文）。傳播學者李金銓回憶1981年應邀回臺參加「國家建設研討會」所見，當時臺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臺都由政戰將官當家，政戰勢力因王昇而高張，李金銓詢諸新聞局長宋楚瑜，宋氏默然。王昇想爭取《七十年代》創辦人李怡為己所用，約見李金銓。歸國建言的學者李金銓因此見識了王昇跋扈的一幕：

王昇的臉色很難看，問我和李怡的關係，我說不認得，也沒有接觸。王轉向「疾風人」（與李金銓一起面見者），要他告訴李怡，如果李改弦更張，臺灣願意既往不咎，並以「反共義士」待之。我不知死活，插問何必如此疾言厲色。這下王昇動怒了：「李怡以為可以罵東罵西，我們手段多得很！」⁸¹

有關王昇專權跋扈的作風，也傳進蔣經國的耳中。他聽說劉少康辦公室書記李廉「對各部會發號施令」、「竟要求各部會向他做簡報」，親自質問王昇；對於王昇執意推動行政院所反對的公教人員精神訓練週會，蔣經國也問他為何一意孤行。⁸²

1982年冬，蔣經國動念調動王昇職務。10月19日，蔣經國首度向時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透露，將在次年3月國民黨二中全會撤換王昇、由言百謙出任總政戰部主任一職。⁸³

二、強人晚年的黨內權力鬥爭

1980年蔣經國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王昇權力不斷擴張，引起黨內競爭者的猜疑、不滿與提防。黨外雜誌報導，王昇政戰系統坐大，使得黨的領導權有明顯弱化現象，傳統以「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局面發生變化，黨部幹部對政工系統過度膨脹頗有微詞；又說劉少康辦公室雖然負責海外與大陸的反統戰工作，實際

⁸¹ 李金銓，〈天亮了！記白色恐怖的王昇與陳文成二、三事〉，收入「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2126883?page=1>（2021/6/14點閱）。

⁸²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410-416。

⁸³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201。

上對國內重大政治問題也極具影響力。⁸⁴ 也有報導指出王昇權大，「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少康辦公室公然發號施令，黨政軍界無人不畏懼、敢怒不敢言，稱之為「小中常會」、「太上中央黨部」、「太上行政院」、「太上總統府」。⁸⁵

獨裁強人蔣經國年老病弱之際，「誰是接班人」成為敏感議題，王昇權大勢張，自然引起黨內競爭者的防備。1982年6月，甫上任參謀總長半年的郝柏村日記中如此記載：

晚間約秦孝儀兄全家晚餐，談及：

一、經國先生有意不競選連任。

二、下任副總統仍將由本省籍人士出任。

（略）……

四、某人權重，而他本疏不諫（間）親態度。⁸⁶

郝柏村日記中的此一記載，透露了強人晚年黨內的詭異氣氛：軍事首長與黨國大老的家庭聚會餐桌上，交談主題環繞在強人是否續任、權重者受側目，也透露王昇自恃蔣經國信任、外人無法離間的傲慢態度。

強人晚期，王昇一枝獨秀，也引來種種掣肘。如前文所述，劉少康辦公室的運作原則是「不破壞現行體制、不干預各單位職權」，僅擁有形式上統合協調權力。但實際上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對黨政軍各機關指天畫地，不僅與既有各機關權限發生競合，更導致種種摩擦，引發各機關的怠工抵制。雖然王昇以對敵鬥爭工作「多如牛毛、急如星火」，要求各機關全力配合，但王復國辦公室成立不久，就發現許多重要工作都無法推動。王昇日記中不斷抱怨各單位負責同志缺乏自信心與責任感、人人都在推託不前、不願多做多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大家都不做，此種現象令他深感失望。⁸⁷

⁸⁴ 叔孫耿，〈宦海浮沉話王昇〉，《鐘鼓樓》，第1卷第5期（1983年5月），頁25。

⁸⁵ 張耿豪，〈王昇，日日升，升為王？〉，《生根》，第9期，頁7。

⁸⁶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119。

⁸⁷ 王昇日記，1980年4月19日、9月9日、10月15日，1981年1月4日、2月12日、6月24日，1982年1月11日。

劉少康辦公室愈積極統合協調各部門，與黨、政、情報部門主管關係愈發緊張。辦公室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但蔣彥士卻總是缺席會議，指定秘書代為主持；王昇向蔣彥士反映此事，但蔣彥士依然故我，令王昇感到不受尊重、心中很是不快。⁸⁸ 為了落實劉少康辦公室的計畫方案，王昇當面要求蔣彥士，將該辦公室每一研究案通過情形、務求貫徹，並與他溝通，計畫如需停止必須明確示知。⁸⁹ 王昇原本期望於文工會執行文化宣傳、對敵鬥爭講習、聯播節目等等，他責怪文工會主任周應龍都推不動、不積極，引起周應龍的不快，多次表達辭意。⁹⁰

王昇與國家安全局長王永樹也有衝突，為了南非情報技術交換的問題，王永樹怪王昇「多事」，令王昇「氣得頭都要破裂了」。⁹¹

行政院長孫運璿與王昇矛盾最深，因為劉少康辦公室許多方案都需要行政院各部會推動，但卻大多落空、未能確實執行。⁹² 例如，劉少康辦公室以「強化心防」為名，建議複製軍中「莒光日教學」作法，使黨政軍各級公教人員於每週一舉行「週會」、觀賞半小時「學術講座」電視教學，並指定由教育部負責此一工作。但教育部認為此事屬於公教人員進修業務，應由人事行政局負責，人事行政局又推給行政院新聞局。⁹³ 為此王昇大為光火，批評教育部是「最老大、最官僚的單位」，教育部次長李模出席早餐會報，「根本是一派推託作風」，令他忍無可忍、以嚴厲口吻指責，李模大感不悅、提早退席。⁹⁴ 劉少康辦公室欲插手經濟事務，研擬經濟作戰方案，行政院也表示已有政務委員周宏濤帶領的「力行小組」負責相關工作，而不加重視。⁹⁵

更重要的是，行政部門孫運璿與王昇的矛盾不只出在權力競合、指揮系統令出多門，兩人對於如何因應國家所面對之挑戰，看法大相逕庭。劉少康辦公室要

⁸⁸ 王昇日記，1980年12月5日、18日、1981年5月28日

⁸⁹ 王昇日記，1982年1月15日。

⁹⁰ 王昇日記，1981年12月4日、1982年7月11日、7月20日、10月4日。

⁹¹ 王昇日記，1981年4月13日。

⁹² 王昇日記，1982年4月21日。

⁹³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411-412。

⁹⁴ 王昇日記，1980年11月13日、1981年2月5日。

⁹⁵ 王昇日記，1982年5月19日、5月22日。

求公教人員觀看電視學術講座，孫運璿對此作法不以為然，質疑「政治教條有甚麼用」？孫運璿也對「加強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宣傳工作綱要」抱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意識形態鬥爭的效用，令王昇極為憤怒。⁹⁶ 王昇將所有挑戰都視為「敵人陰謀」，不斷加強政治作戰力道；但孫運璿懷疑行之有年的政戰宣傳成效，認為已無法因應時代變化與挑戰。

此一現象印證了前文所述AIT對統治集團內部強硬派與改革派路線衝突的觀察。AIT認為，國民黨內改革派如陳履安犀利批判王昇等保守派，主張應透過自由化的政策進行改革，才能爭取廣大民心；務實派技術官僚也懷疑意識形態宣傳的實際效用，並認為保守強硬政策不僅壓縮與美國的關係，更會引發社會不滿與不安。⁹⁷

為了要求黨政部門加強合作，劉少康辦公室於1981年6月制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實施要點」，調整運作方式（如圖1），除了王昇主持「研究會報」之外，每個月另由黨秘書長蔣彥士主持「綜合會報」、行政院長孫運璿主持「決策會報」，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督促黨、政部門積極落實劉少康辦公室所研擬之方案。但是，行政院配合情形仍不如預期，王昇深感「事實證明並不簡單」。⁹⁸ 他甚至親自找孫運璿長談，希望黨主席蔣經國核定的計畫能一一貫徹、有效落實，實在做不通的，就要呈復主席、「決不欺騙主席」。⁹⁹ 此一幾近攤牌的作法，無異是以蔣主席的權威直接施壓於行政部門。

王昇的強勢導致黨政各路人馬向蔣經國告狀。1981年年底，有人為教育部電視學術講座之事向蔣經國告狀，蔣怒斥王昇一意孤行。1983年初，蔣經國質問，為何劉少康辦公室的業務擴展如此之廣？為何與行政部門例行工作重複？王昇雖向蔣經國說明辯解，但心中推測是行政院秘書長馬紀壯告的狀。¹⁰⁰

工作上推動困難、與黨政部門的種種不快，令王昇幾度萌生辭職的念頭，

⁹⁶ 王昇日記，1981年12月21日、1982年2月23日。

⁹⁷ Post-normalization Taiwan, AIT, October 23, 1979, U.S. in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⁹⁸ 王昇日記，1981年5月20日、6月25日。

⁹⁹ 王昇日記，1981年6月26日。

¹⁰⁰ 王昇日記，1983年1月26日。

1981年5月8日曾向蔣經國表達辭意，但遭蔣經國回絕。¹⁰¹ 即使王昇曾萌生退意，最後仍自我勉勵，將國家前途繫於一己之身：

……我所推動的對敵鬥爭是有高度政治性，我遭遇到共匪、台獨、國內政治陰謀份子的忌恨與打擊，現在更看出內部人士的破壞與打擊。在對我個人來說，應該急流勇退，至少心理上應有「被打下來」的準備。但黨國前途、民族前途其將奈何。現在正是我進退為難的關鍵時刻。¹⁰²

1983年3月，王昇訪美返臺後，從蔣彥士口中得知自己將被調職，他斷定是因為「總統身邊已受到多方面對我的破壞與打擊」。¹⁰³ 4月20日，王昇又從蔣彥士口中得知，劉少康辦公室決定取消。¹⁰⁴

5月5日，蔣經國決定將王昇調任為國防部聯訓部主任，參謀總長郝柏村持不同意見，認為應調任戰略顧問為宜，並屢屢於面見時表達。蔣經國雖欲冷凍王昇，並不打算將他調任無實權之空職。郝柏村一再進言，「此非余之固執，實乃一片愚忠」。¹⁰⁵ 5月10日，蔣經國召見王昇，仍然決定將他調任為聯訓部主任，理由是「因為（總政戰部主任）任期太久，經過長期考慮決定調動。」¹⁰⁶

王昇一旦落馬，更遭暗箭攻擊。離職前的5月中旬，王昇先後到左營與復興崗演講，尤其在復興崗面對中部以北校級以上政戰官講話時，受到氣氛感動再也忍不住，「當眾失禮，熱淚奪眶」。¹⁰⁷ 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廖祖述向王昇反映，因王昇調動、部隊不安，建議他到南部召集政戰人員講話。王昇擔心此舉將引起誤會，希望請示參謀總長郝柏村。¹⁰⁸ 7月17日，郝柏村一面向蔣經國報告王昇將到各官校進行系列政治教育演講，因為「今日國軍將領能做革命理論及革命精神教育者，無人出化行之右」；一面則敦促王昇「對革命傳道應盡責任，不能

¹⁰¹ 王昇日記，1981年2月25日、3月6日、5月8日。

¹⁰² 王昇日記，1983年1月27日。

¹⁰³ 王昇日記，1983年4月7日。

¹⁰⁴ 王昇日記，1983年4月20日。

¹⁰⁵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319-320。

¹⁰⁶ 王昇日記，1983年5月10日。

¹⁰⁷ 王昇日記，1983年5月16日。

¹⁰⁸ 王昇日記，1983年5月12日。

因敵人中傷而銷聲匿跡」。¹⁰⁹ 在郝柏村的鼓舞下，王昇遂以輕鬆愉快的心情應允前往各校演講。¹¹⁰

豈知7月29日蔣經國收到檢舉，指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演講內容謂「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郝柏村向政戰學校校長林強查證王昇的演講內容，並調來錄音紀錄檢閱。8月1日，郝柏村向蔣經國報告調查結果，澄清並無「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之語，但證實王昇有說「王昇是打不倒的」，蔣經國認為甚不得體。¹¹¹ 尼洛所著王昇傳記中則指出，郝柏村「命令」王昇到部隊中講話，卻在一星期後報告蔣經國，轉述有人說王昇在演講中有「唯我王昇才能反共」的謠言。¹¹²

1983年8月18日，行政院長孫運璿約見王昇，告知將派王昇出任巴拉圭大使。¹¹³ 19日，蔣經國總終於召見王昇，談到劉少康辦公室問題，日記記載了談話要點：

……劉少康似已形成雙線領導，有兩位常委對我談及此事。我一向對黨內重視團結而不許派系爭鬭，我以為劉少康再發展下去，勢將另成一派系。

我認為劉少康辦公室結束對你是有益的。

關於調職是任期制度的原因，我曾與高部長談過。

派你去南美當大使是我提議的，此一歷練對你將有幫助，我一度任東北外交特派員對我有很大的磨練。¹¹⁴

同樣作為蔣經國子弟兵、救國團出身的李煥認為，蔣經國的用人哲學獨鍾「隱藏」，特別忌諱幹部自營人馬、組織小圈圈、反對搞派系、最痛恨自我宣

¹⁰⁹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364。

¹¹⁰ 王昇日記，1983年7月19日。

¹¹¹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370-373。不過，王昇日記中所記8月19日郝柏村對他轉述與蔣經國的談話，與郝柏村日記所述稍有出入。王昇日記：「總統對我說王昇在復興崗講話時曾經說我王昇是打不倒的，有成千成萬的王昇」，「郝總長將我講話的紀錄看完後向總統報告『王主任並未如此講過』」。王昇日記，1983年8月19日。

¹¹²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415。

¹¹³ 王昇日記，1983年8月18日。

¹¹⁴ 王昇日記，1983年8月22日。

傳。¹¹⁵ 蔣經國和王昇的談話顯示，他確實認為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勢力坐大、將成為黨內一大派系，故將王昇調職、並結束劉少康辦公室運作。1980年代令人聞之喪膽的王昇將軍及其所捲起的風雲變幻，一夕之間煙消雲散。

三、美國政府對臺灣民主化的態度

1970年代末期，美國社會對政府在越戰中獨斷獨行的不滿日漸升高，反對總統與國務院秘密外交、支持獨裁政權，美國國會乃主導通過多項人權法案，並關注友邦人權問題。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日益關心臺灣人權問題與民主運動發展。

1978年6月黨外人士陳菊被捕事件，在國會議員與人權團體施壓之下，美國大使館向中華民國外交部表達關切，並以影響兩國關係、軍售案、進出口銀行之貸款等方式施壓。¹¹⁶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1980年元月美國政府派出AIT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前往臺北力說蔣經國，他強調嚴懲人犯會傷害聲譽，也將使得斷交後的美國與臺灣當局的互信建立更加困難；反之，如果臺灣解嚴、捨棄軍事審判、允許黨外人士表達異議，將獲得美國與其他國家更多支持。¹¹⁷ 美國國會議員對美麗島事件極為關切，施壓國務院，國務院不僅要求派員旁聽軍法大審，甚至公開發表聲明。¹¹⁸ 1981年7月發生陳文成事件，引起美國輿論與國會強烈反應，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東亞小組主席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 1940-2010）威脅將杯葛對臺軍售。¹¹⁹

1982年元月，AIT臺灣辦事處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 1928-2009）到任前，蔣經國派人到華府與其聯繫，表達對臺灣政治革新的腹案。蔣經國的特使

¹¹⁵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公司，1997年），頁153-154。

¹¹⁶ 「沈昌煥呈蔣經國報告關於陳菊被捕事件美方之反應情形」，〈外交—外交事務散件資料（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184-008。

¹¹⁷ 李潔明（James R. Lilley）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03年），頁246。

¹¹⁸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電外交部據稱美國國務院對高雄事件之審理表示關切」，〈高雄事件美方反應〉，《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9905-00025-064；王昇日記，1980年4月26日。

¹¹⁹ 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頁247。

也向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席席格爾（Gaston Sigur, 1924-1995）透露其四大改革方向：民主化、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中國開放，席格爾將這些訊息轉述給李潔明。¹²⁰

作為威權體制下的實力人物的王昇，是美國政府長期觀察、特意建立關係的對象。AIT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就與王昇多有接觸，建議王昇對臺灣基層民主運動不要過分限制，以使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獲得更好的形象；但是王昇認為這是「美國朋友對許多問題常有誤會」。¹²¹ 1982年元月，AIT處長李潔明到任後，也常常與王昇見面長談。¹²² 由於王昇與美方意見不同，屢屢向美方提出「忠告」，同年9月27日，丁大衛與李潔明力邀王昇「讓華府要人能聽到（王昇說的）這些話」。¹²³

1982年11月，蔣經國透過郝柏村指示「同意往訪，注意保密」，但王昇並不知美方邀訪的目的為何。¹²⁴ 12月初，王昇仍對是否訪美猶豫不決，美方則希望儘早確定訪美日期，停留時間約一週至十天。¹²⁵ 1983年2月，蔣經國召見王昇問訪美事，蔣經國問：「美方的用意何在？」王昇說：「我一直不能完全瞭解」，最後請示蔣經國有何指示，蔣經國只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王昇不解其意。¹²⁶

1983年3月7日到18日王昇訪美。一般認為王昇訪美過程功高震主，¹²⁷ 或因《時代》雜誌報導王昇為「蔣經國接班人」，導致王昇落馬，¹²⁸ 以上種種傳言未必可信。王昇返臺後十天，3月29日蔣經國即以「尊重任期制度」為由，指示郝柏村調整王昇總政戰部主任職務。¹²⁹ 31日，郝柏村與王昇商談職務調動事宜。¹³⁰

¹²⁰ 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頁245。

¹²¹ 王昇日記，1981年9月25日。

¹²² 王昇日記，1982年2月11日、4月30日、5月12日、5月14日。

¹²³ 王昇日記，1982年9月27日。

¹²⁴ 王昇日記，1982年11月10日。

¹²⁵ 王昇日記，1982年11月10日。

¹²⁶ 王昇日記，1983年3月24日。

¹²⁷ 秦三，〈王昇訪美，更上一層樓！？〉，《鐘鼓樓》，第1卷第5期（1983年5月），頁26。

¹²⁸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80。

¹²⁹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293。

¹³⁰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295。王昇日記中則記載4月4日獲參謀總長郝柏村

直到4月11日，蔣經國才召見王昇報告訪美情形，王昇一再請示有關職務調動問題，但蔣「卻無答覆，都說沒有其他事了」，¹³¹ 不予回應。從蔣經國鼓勵王昇赴美訪問過程、返臺後十日即將其調職等過程推敲，王昇去職一事早已決定。

郝柏村在日記中記載王昇返臺後報告訪美情形，說明在美會見自由派、中間派、保守派人士，並從眾議員索拉茲、參議員甘迺迪（Ted Kennedy, 1932-2009）談話中發現他們十分關注臺灣的戒嚴問題、要求釋放美麗島事件受刑人。¹³² 可知美國政府邀訪，主要在傳達對臺灣人權問題與民主發展的關切。郝柏村日記中說「王化行訪美有收穫而成功，丁大衛認為在不聲張情形下，將努力邀請適當人員訪美，今後中美關係在低姿勢下多實質溝通與接觸至為重要。」¹³³

丁大衛回憶錄中證實，美方關切臺灣人權問題，AIT官員以私人談話方式施壓、說服蔣經國及其高層官員推動人權與民主的臺灣形象與對美關係的好處。美方邀請王昇訪問，安排他與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學術界見面，傳達美方對臺灣人權議題與政治改革的關切。¹³⁴

另據《李潔明回憶錄》，也說明美國政府邀請王昇訪美的目的，並對王昇下臺一事有所詮釋：

為了讓王昇理解美國輿論對臺灣人權狀況的關切相當深切，我邀請他到美國訪問，俾能親自聽到美國政壇人士對於臺灣對待政治異議人士做法的看法。當時我覺得，蔣經國總統也明白讓王昇到美國走走瞧瞧，會有什麼好處；因此，可以說是我們兩人聯手，為了臺灣的利益，安排王昇訪美。蔣經國已經表明他希望推動臺灣民主化，而說得不客氣一點，王昇卻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顆大石頭。蔣經國固然感念王昇多年來的忠誠，可是王昇已經成為蔣經國的負擔。王昇一回國，等著他的卻是遠謫巴拉圭。¹³⁵

告知，蔣經國將調動他的職位。參見王昇日記，1983年4月4日。

¹³¹ 王昇日記，1983年4月11日。

¹³²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289。

¹³³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上冊，頁300-301。

¹³⁴ David Dean, *Unofficial diplomac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 memoir*, pp.163-164.

¹³⁵ 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頁247-248。

李潔明說美方與蔣經國聯手安排王昇訪美、移除民主絆腳石，此一詮釋或許太過，但可以看出美方對臺灣軍事強人掌權的戒心。

198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持續對蔣經國施壓、要求推動臺灣民主化。但強硬派王昇權力持續擴大，劉少康辦公室更將工作重點放在島內、打擊黨外人士、壓制民主運動、限制言論自由，政治氛圍大為緊縮，在在引起美方關注。如林孝庭所說，美方對臺灣民主化的關切壓力推促蔣經國推動改革工程，美方要求臺灣民主化，恐怕也是王昇難以繼續掌握大權的因素之一。

王昇倒臺後，美方依舊對臺灣出現軍人主政的可能性高度警覺。據林孝庭研究，參謀總長郝柏村受到蔣經國倚重後，美方人士也將郝柏村視為臺灣走向民主化的絆腳石、擔心出現軍政府，甚至不客氣地當面質問，¹³⁶ 都顯示美國政府對臺灣政情的持續關切。

陸、結論

王昇及其子弟兵常常強調，王昇被撤職失勢一事是中共陰謀得逞，因為劉少康辦公室成立積極展開反統戰工作，成績輝煌，中共得知該單位由王昇負責，乃成立「擒王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領導；「擒王小組」從香港、日本、美國、臺澎各地對王昇全面發動污衊與攻擊，最終發揮作用，瓦解了蔣經國對王昇的信任。¹³⁷ 王昇日記也提及，1983年11月3日赴任巴拉圭前與蔣經國的最後一席談話。他請蔣經國須「特別重視敵人的統戰，敵人無孔不入、無惡不作，最擅長利用我們自己的手打破自己的頭」；並提醒「不可在敵人未垮之前，我們自己先垮」。¹³⁸

政治作戰出身的王昇，一生反共、反統戰，最後卻將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歸咎於敵人的統戰工作的成功。王昇此說只是自我安慰之詞。綜合前文的探討，筆

¹³⁶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頁368-369。

¹³⁷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頁277-278、291。

¹³⁸ 王昇日記，1983年11月4日。

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首先，威權統治晚期蔣經國對於臺灣民主發展究竟抱持何種態度？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以來，為了維繫國民黨政權，曾以溫和路線增加臺籍人士政治參與機會、收編反對運動，因此有所謂「軟性威權」（soft authoritarianism）之說。¹³⁹ 1979年AIT的政治報告研判，蔣經國會持續溫和改革路線。

但事實上蔣經國的溫和路線並未有效發揮作用，本地菁英追求民主未曾妥協，利用選舉動員擴大發展，1977年中壢事件更顯示反對運動的挑戰能力不斷升高。蔣經國決定改弦更張，採取強硬手段，1978年底藉著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宣布中止中央民代增額選舉、阻斷競爭。1979年起蔣經國的強硬手段逐步登場，1月余登發父子被捕，接著藉各種手段壓縮民主運動空間，12月全面逮捕黨外人士，史稱「美麗島大逮捕」。

美麗島大逮捕同樣未能有效壓制反對運動，軍法大審反而使得黨外人士獲取更多同情。此時又面對中共與美國建交後、鄧小平宣布「三通四流」、「和平統一」新統戰宣傳局面。蔣經國因美國斷交、黨外挑戰、加上中共統戰新攻勢三面受敵，在危機時刻欽點他所信賴的王昇主持劉少康辦公室、協助因應內外變局。王昇上台，無疑是蔣經國採取強硬路線的最高峰。

檢視威權統治末期此一過程，筆者認為，蔣經國作為威權體制的領導者，首要目標在維繫統治於長久，他軟硬兼施、窮盡各種路線，都無法化解黨外民主運動對其政權的挑戰，美麗島大逮捕後，反對運動更加茁壯。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登場，意味著蔣經國以強硬路線力挽狂瀾。

蔣經國選擇強硬路線壓制政權危機，使得自美麗島大逮捕以來緊繃的政治氛圍愈發嚴酷，情治機關猶如猛虎出閘，行事更加肆無忌憚。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案等政治暴力事件都在此時爆發，正顯示強硬路線抬頭後情治機關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後果。民間言之鑿鑿此些暴力案件是王昇所主使，但筆者認為，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雖主導對敵鬥爭策略，但並非情治機關首腦，無權下令

¹³⁹ 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pp. 481-499.

指揮，並且缺乏明確證據支持王昇與這些案件有關。惟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江南案經美國聯邦調查局偵破是中華民國情報局指使黑道幫派下手殺害異議者，而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都發生在此一時期，情治機關以血腥手段震懾臺灣社會的說法不脛而走。事實證明，1980年代統治當局的殘暴血腥手段無法嚇退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反而觸及人們的道德底線、激起更多民眾的強烈反感。

其次，就像所有威權獨裁政權共同面臨的難題，獨裁者老邁病弱之際，正是統治集團內部激烈政治鬥爭上演的時刻。因為獨裁者即使老病孱弱、也無法提前指定接班人削弱自己的領導權；又無法透過民主機制產生新的國家領導人，接班人權力寶座必然成為各方人馬爭奪的目標，這也使將使威權統治陷入更大的危機。

1980年代強人蔣經國不僅老邁，且有嚴重的糖尿病纏身，1981年一整年，各種有關接班人的議題在政壇耳語不斷。1982年2月3日，蔣經國住進臺北榮民總醫院進行眼部手術，雖然新聞宣稱「蔣總統三日入院治療眼疾，手術順利，身體其他狀況良好」。¹⁴⁰ 但民間對蔣經國的健康問題議論紛紛，黨外雜誌更是公然討論「誰是蔣經國接班人」；¹⁴¹ 甚至出現所謂「政權移交小組」、「五人危機處理小組」已經成立的傳言。¹⁴²

王昇自1970年代以來權力逐漸壯大，從軍方擴張到文藝界、新聞界、學術界。王昇得勢之後行事跋扈，蔣經國曾加以責備制止。但是，1980年面對內外危機時，蔣經國又不得不啟用王昇主持劉少康辦公室。王昇則利用此一機會全面

¹⁴⁰ 〈大事周記〉，《聯合報》，臺北，1982年2月7日，版2。

¹⁴¹ 張耿豪，〈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深耕》，第24期（1982年12月15日），頁7。另，1982年5月15、30日，《國是評論》第9、10期連續刊載吳三連、林洋港、孫運璿、康寧祥可能被提名為第七屆副總統候選人；7月，《縱橫》第16期刊載徐策，〈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認為孫運璿、蔣彥士、王昇、蔣緯國、林洋港分別為第一到第五順位接班人。黨外雜誌甚至建議最高當局應趁局勢尚可控制時，做好權力轉移工作，上策是排除憲政障礙、建立接班制度；中策是暫時選定可靠並具民主素養之文人接班，避免朝向軍人接班方向發展；下策是以政治安定為考量培植強人，防止內鬨造成中共的非分之想。參見徐策，〈關於『接班人』的幾點補充說明〉，《縱橫》，第17期（1982年8月），頁46-47。

¹⁴² Thomas A. Marks著，張聯祺、李厚壯等譯，《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頁291。

擴大勢力，逐漸展現軍事強人的接班姿態。面對王昇的野心勃勃，蔣經國看在眼裡，1982年冬已動念解除他的權力。蔣經國從早先「不願看到他自我毀滅」，到「不願劉少康辦公室形成雙線領導」，皆因王昇自恃獲得蔣經國信任，不知節制、專擅權力，這應是他突然被罷黜的主因。

再者，1980年代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的起落，也有助於人們重新審視威權晚期臺灣統治內部實況。長期以來，民間對於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有許多神秘想像、令人畏懼的權力傳聞，王昇日記中也記載諸多黨外人士、政治犯家屬向他求情、尋求協助。但實際上，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受到統治集團內部各方抵制、無法順利運作。王昇在強人病弱之時獲得大權，引燃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競爭，尤其與黨秘書長蔣彥士、行政院長孫運璿關係最為緊張，種種不利指控出現在蔣經國面前。此一現象顯示，強人晚期不只要面對來自臺灣社會的挑戰，還要安撫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尤其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不僅因為權力爭奪，也涉及自由派與保守派的路線競爭，顯示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面對臺灣社會挑戰時並非鐵板一塊。

最後，筆者認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美國政府的角色應該受到更多關注。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末期關切臺灣的人權狀況與民主發展，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蔣經國為維繫與美方的實質關係，曾對臺灣民主化有若干承諾。1980年代強硬派政戰勢力王昇掌握大權，劉少康辦公室以對敵鬥爭名義打壓島內民主運動，明顯違背美方期待。1983年王昇訪美後突然去職，美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有待檔案開放後進一步驗證。

附錄1、劉少康辦公室研究案件列報表（1980-1982）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綜合	勸告中共放棄共產主義運動推行計畫綱要及實施細則草案	1980.9	文工會	本案勸告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制度與組織，雖實施已見成效，猶待繼續辦理，並予以加強。
	擴大爭取海外僑領學人案	1980.10	辦公室	對海外臺獨、親匪勢力之爭取瓦解，獲致相當成效。
	成立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協助海外團結工作、推進基地社會革新案。	1980.12	辦公室	團結自強與社會革新運動，頗受各方支持，仍待繼續擴大影響，以竟全功。
	針對匪審匪案提出反擊行動方案	1980.12	總政治部、文工會、新聞局、亞盟	對全國同胞提高同仇敵愾心理，有相當大成效。
	針對偽憲法修改草案之初步觀察及應採措施案	1982.5	外交部、新聞局、安全局、陸工會、文工會	已做到反制原則，並使宣傳工作有所依循。
	針對當前共匪、臺獨及國內政治陰謀分子叁股逆流相互激盪之嚴重性，確立對敵鬥爭工作重點，力求貫徹實施案。	1982.6	安全局、外交部、文工會、政策會	因本案之提出，而提高各方對當前國內不穩情勢之警覺，正自各方力加遏止中。
	廖承志函心戰宣傳做法之研究	1982.7	文工會	對廖匪統戰已完成反擊，並藉機展開海外宣傳工作。
	香港前途問題及我應採對策之研究	1982.8	行政院各部會、中央黨部各工作會、安全局、力行小組	對香港問題已有統一看法、說法與對策，尤其經濟方面，透過力行小組已有進一步規畫。
	對匪黨「十二大」之初步研析與對策建議案	1982.9	行政院各部會、中央黨部各工作會等25個單位	研擬具體反制辦法，加強各單位對敵鬥爭工作，頗具成效。
對敵思想鬥爭分工實施要點	1982.11	文工會、新聞局、海工會、陸工會	對思想作戰已有具體分工，對文宣工作亦將責有專成。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基地	高雄暴力事件審判前後洗清政治污染工作方案	1980.4	各有關單位	各單位全力策辦，分段實施，已收精神污染清洗之效。
	各單位設立對敵鬥爭小組案	1980.4	調查局	與人二室（以下不詳）
	成立政策措施評鑑小組案	1980.4	政策會	奉示送主官會報參考，不再辦理。
	強化便民防弊工作研究案	1980.6	調查局	行政院有政風會報、調查局有貪污犯罪防制中心，有待進一步研究加強實施貫徹。
	學術講座案	1980.7	教育部	本案以全國公教人員為對象
	對當前物價問題之研究	1980.8	經濟部、財政部	已送參
	證券市場可疑資料之研究	1980.8	財政部	已送參
	關於物價政策幾點意見	1980.8	財政部、經濟部	已送參
	對推動稅務改革強化稅務行政案	1980.9	財政部、經濟部	已送參
	對租稅改革之建議	1980.9	財政部、經濟部	已完成作業任務
	建立民主選舉新形象案	1980.9	組工會、青工會	選用大專青年擔任選務工作，不但提高青年對國家之參與感，一般民間反應亦甚良好。
	成立中央文化工作會報	1980.10	文工會	尚待聯繫協調，加強實施。
	國外校友會召開年會或重要學術會議，我方因應辦法案	1980.10	教育部	對反制共匪利用國際會議等進行統戰活動，已有原則性之對策。
加強與教育學術界之聯繫與溝通案	1980.11	教育部、研考會、青工會	各單位已約請專家教授參加政策研究及聯繫工作。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
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加強新聞界聯繫溝通工作要點	1980.12	文工會、新聞局	文工會已會同新聞局等單位隨時召開新聞背景說明會，溝通工作要點。
	當前我國物價上漲之原因與對策	1980.12	經濟部、經建會	已完成作業任務
	如何強化民主法治教育鞏固復興基地之研究案	1980.12	教育部等單位	已完成作業任務
	如何防止共匪及臺獨滲透活動	1981.1	安全局	併案實施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檢討建議案	1981.2	組工會	已列為今後輔選工作之參考
	如何動員與運用宗教力量案	1981.2	社工會、內政部	對宗教力量運用情形，併於基督教長老會案辦理。
	成立中央民運工作會報	1981.2	社工會	尚待聯繫協調、加強實施。
	如何鞏固與擴大本黨的社會基礎案	1981.3	社工會	已完成作業任務
	取締漁民利用公海走私之法律依據案	1981.3		已由司法院參辦
	體育界出國比賽人員講習工作計畫	1981.4	社工會、教育部、體協	各體育團體出國比賽，均能在行前舉行講習，提高對敵鬥爭警覺，及應付匪偽統戰方法。
	加強本黨籍僑生對敵鬥爭訓練，協助展開海外對敵鬥爭案（僑生講習案）	1981.4	青工會等有關單位	加強僑生對敵鬥爭、聯繫、爭取向心，均有成效。
	臺灣省地方派系之分析	1981.4	各有關單位	已完成作業任務
	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與政策	1981.5	財政部、經濟部、經建會	已完成作業任務
	揭穿共匪三通四流陰謀之聲明、對共匪三通四流陰謀之對策案	1981.5		送孫院長參考，併案辦理。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何以不能與共匪通商、通郵、通航	1981.5		送孫院長參考，另已列入對敵鬥爭工作手冊，送各單位參考。
	大眾傳播工作研討會	1981.5	文工會、革命實踐研究院	頗收強化本黨新聞從業同志對敵鬥爭之成效，發揮種子功能、擴大講習效果。
	文教工作研討會	1981.5	青工會、教育部、革命實踐研究院	頗能加強警覺，使知青擔負對敵鬥爭工作任務。
	輔選提名方式的商榷	1981.6	組工會等單位	已完成作業任務
	強化立監兩院組之功能、增進行政與立法監察之協調聯繫案	1981.7	政策會	已初步協調，由政策會參辦。
	如何強化工會組織領導與正常活動之研究案	1981.9	社工會	已貫徹實施
	如何強化農會組織領導與正常活動案	1981.9	社工會	已貫徹實施
	建立黨內傳達制度以溝通思想概念，使上下一心、步調一致，發揮整體力量，迅赴事功	1981.9	政策會	已完成作業任務
	突發事件立即處理程序	1981.9	安全局	已完成處理程序，並送各單位處理。
	對當前陰謀分子所謂「台灣民主運動」的真相研析與對策研究	1981.11	安全局、文工會、組工會	併案研辦中
	1981年聯邦盃女子網球賽應否參加之研究案	1981.11	有關單位	已參照決議核定參加比賽
	無黨籍人士組黨意圖之研析與對策案	1981.11	政策會單位	併「禁制組黨研究案」辦理
	廖匪承志對產經記者發表統戰談話及其對策研究案	1982.1	文工會、海工會	文工會、海工會參處，並列為訓練材料。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
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當前國內政治活動概況與對策	1982.4	安全局、新聞局、文工會、社工會、組工會、政策會	對國內反政府分子活動情形已能切實掌握，隨時協調有關單位加強因應對策，安全局、社工會、組工會並將本案併入專案計畫實施。
	在臺定居國人經由海外通信及潛往匪區狀況檢討及防制建議案	1982.4	法務部、國防部、安全局、調查局、人事行政局、警總等單位	警總研擬實施細則，國防部研辦中，原則通過，具體執行工作尚待加強。
	對臺獨之剖析與對策案	1982.4	安全局	安全局併同預定計畫辦理
	基督教長老教會問題之研究	1982.5	內政部、社工會	內政部訂定宗教法案審議中
	在共匪對我加強和平統戰情勢下如何防止匪諜滲透破壞之研析與建議研究案	1982.5	調查局	併同執行單位工作計畫辦理
	強化對匪經濟作戰之研究	1982.5	力行小組	力行小組與本辦公室密切聯繫，各項計畫在積極推展中。
	對基地外籍人士居留聯繫與服務之檢討與建議案	1982.5	內政部等有關單位	已完成作業，並由內政部警政著手執行中。
	強化基地心理建設計畫綱要	1982.6	文工會	文工會已成立「清新小組」，專案策畫進行，頗多績效。
	維護警察人員形象案	1982.6	內政部	原則尚待商榷，由內政部研商辦議，尚待舉體研擬。
	經濟發展中所生問題之分析及其預防措施之研究案	1982.7	財政部、經濟部、經建會	併力行小組「對敵經濟作戰案」

類別	案由	立案時間	權責單位	得失檢討
	防制共匪利用選舉對我進行政治破壞之研究	1982.7	安全局	函請安全局策辦
	國內反政府陰謀分子預謀組黨活動之分析與對策研究	1982.7	文工會、社工會、青工會、組工會、政策會、教育部、內政部、法務部、新聞局、安全局、警總、國家安全會議	本案為第一階段建議，有利於進一步採取對策之參考。
	各縣市文化中心設置國情資料展示館之研究案	1982.8	文建會	視各縣市情形個別籌設中

資料來源：「恭呈七十一年年終工作檢討會資料」（1982年12月22日），〈劉少康辦公室檔案〉，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Collection: 2013C5, Box 5.因資料限制，無法得知該辦公室1983年研究案主題。又，粗體表示國內黨外民主運動相關問題。

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
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

附錄2、黨外雜誌羅列各界王昇政戰系人馬

	姓名	背景	
文化界	馮滄祥	東海哲學系主任	
	傅佩榮	臺大哲學系講師	
	洛夫	作家	
	朱西寧	作家	
	司馬中原	作家	
新聞傳播界	祝振華	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廣電系主任	
	尹雪曼	《臺灣新生報》副總編輯、《榮光周刊》社長	
	葉建麗	中央社副社長、文工會總幹事	
	《聯合報》 系統	張作錦	《聯合報》總編輯、美國《世界日報》社長
		趙玉明	《民族晚報》及《聯合報》總編輯、印尼《世界日報》社長
	痲弦	《聯合報》副刊主編、《聯合文學》月刊社長	
	陳曉林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民生報》及《聯合報》總主筆	
	《青年戰士報》 《台灣日報》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影劇界	明驥	中央電影公司（中影）總經理	
	吳寶華	總政治部副主任、華視總經理	
	劉藝	中央電影公司（中影）製片	
黨政界	梁孝煌	組工會主任	
	白萬祥	陸工會主任	
	劉國治	陸工會副主任	
	周應龍	文工會主任	
	李在方	新聞黨部書記長	
	謝又華	省黨部副主委	
	雷醒岸	宜蘭縣黨部主委	
	林榮彬	臺北縣黨部主委	
	尹竑	高雄縣黨部主委	
	萬定一	屏東縣黨部主委	

資料來源：江帆，〈不堪重彈將軍令 王昇調職傳聞〉，《生根》，第9期（1983年5月25日），頁9；〈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收入「國立台灣文學館」：<http://www3.nmtl.gov.tw/Writer2/index.html>（2020/10/30點閱）；〈劉藝〉，收入「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757>（2020/10/30點閱）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外交部》（臺北，國史館藏）

〈高雄事件美方反應〉。

《國家安全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防制臺獨方案〉第6卷。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外交—外交事務散件資料（一）〉。

〈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二）〉。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Palo Alto,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王昇日記〉。

〈劉少康辦公室檔案〉。

二、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攬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李潔明（James R. Lilley）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賴名湯，《賴名湯日記III》。臺北：國史館，2017年。

三、雜誌、報紙

《生根》，臺北，1983年。

《前進》，臺北，1981-1983年。

《前進廣場》，臺北，1980-1983年。

《深耕》，臺北，1980-1983年。

- 《暖流》，臺北，1980-1983年。
《縱橫》，臺北，1982年。
《鐘鼓樓》，臺北，1983年。
《聯合報》，臺北，1980-1982年。

四、專書

- 尼洛（李明），《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
江南（劉宜良），《蔣經國傳》。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
吳子俊主編，《國軍政戰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83年。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臺北：春山出版公司，2020年。
吳建國，《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7年。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臺北：遠足文化公司，2021年。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郝柏村，《八年總長日記》。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陳祖耀，《王昇的一生》。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0年。
Marks, Thomas A. 著，張聯祺、李厚壯等譯，《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
Dean, David. *Unofficial Diplomac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 Memoir*. Bloomington, Indiana: Xlibris, LLC, 2014.
Marks, Thomas A.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Wang Sheng and the Koumintang*. London: Frank Cass, 1998.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汪振堂，〈揭開「劉少康辦公室」面紗〉，《傳記文學》，第90卷第2期（2007年2月）。

高素蘭，〈中共對臺政策的歷史演變（1949-2000）〉，《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2004年9月）。

馮滬祥，〈追憶經國總統與王昇將軍〉，《傳記文學》，第90卷第4期（2007年4月）。

Winckler, Edwin A.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9 (September 1984).

六、網路資料

〈天亮了！記白色恐怖的王昇與陳文成二、三事〉，收入「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2126883?page=1>（2021/6/14點閱）。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收入「台灣文學館」：<http://www3.nmtl.gov.tw/Writer2/index.html>（2020/10/30點閱）。

〈陳水扁拜會國策顧問王昇〉，收入「華視新聞網」：<https://news.cts.com.tw/cts/general/200004/200004140041302.html>（2020/10/30點閱）。

〈劉藝〉，收入「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757>（2020/10/30點閱）。

Inventory of the Wang Sheng papers,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http://www.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j96716/?query=wang+sheng>. Accessed April 5, 2021.

七、資料庫

Post-normalization Taiwan, AIT, October 23, 1979, U.S. in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